

晚明耶穌會士 在穗澳地區的圖書出版活動

潘劍芬*

16世紀末，耶穌會士隨歐洲商船到達澳門，並試圖通過廣州進入內地傳教。為了更好地促進傳教事業的發展，他們出版各種有助於傳教的書刊。1581年，耶穌會士羅明堅首先在廣州用中國雕版印刷術印行書籍，拉開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進行出版活動的序幕。1588年，范禮安把西方先進的活字印刷機器帶到澳門，澳門也因此成為近代鉛印設備傳至中國的橋頭堡。本文以羅明堅、利瑪竇和范禮安在穗澳地區的圖書出版活動為主線，勾勒出明朝末年耶穌會傳教士在穗澳兩地的出版活動概況。

16世紀末，天主教耶穌會士隨歐洲商船來中國，首先到達澳門，並試圖進入內地傳教。由於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文化的衝突及中國政府的禁教政策，傳教士的活動舉步維艱。被譽為“中國的傳教之父”的范禮安在詳盡地瞭解中國國情之後，徹底改變了耶穌會的傳教方針，提出與其使中國人葡化不如使傳教士中國化的適應性傳教策略。在這種傳教策略的指導下，羅明堅等傳教士首先認識到了書籍這種“啞式宣教法”對於發展傳教事業的重要性：

因為書籍是最能言的，又是最有效的，它能責備中國人生活的無系統，而不致傷及他們的雅意；它能光照他們的心地，而不致和他們的理智發生衝突；可以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認識真理。利瑪竇也說過：“在中國有許多處傳教士不能去的地方，書籍卻能走進去，並且依賴簡捷有力的筆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裡行間，透入讀者的心內，較比用語言傳達更為有效。”⁽¹⁾

基於這種認識，耶穌會士為傳播天主福音，一次次衝破朝廷禁止西洋人印書的禁令，首先在澳門、廣州等地拉開了出版活動的序幕。然而，此舉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傳教士們始料未及的：他們未

能使中國基督教化，卻促成了澳門印刷出版業的發軔，並且把西方先進的活字印刷機器帶到了澳門，使之成為近代鉛印設備傳至中國的橋頭堡。

羅明堅：在華出版中文書籍的歐洲第一人

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字復初，1543年生於意大利拿波里威諾沙教區斯皮拿卓拉鎮（Spinazzola），在拿波里攻讀民法與聖教法十年之久，獲以上兩個法學博士學位，後在羅馬神學院修神學一年。⁽²⁾羅明堅在天主教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他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的西方傳教士；1581年，他在廣州翻譯、出版了拉丁文版《三字經》，成為在華翻譯並出版中國著作的第一位歐洲人；1584年，他在澳門出版了其中文著作《天主實錄》，是第一本由歐洲人出版的中文書籍；1585年，他在澳門出版了《拉丁文-中文辭典》，這是西方傳教士編著、出版的第一部學習中文的工具書。正是這位著名的漢學先驅——羅明堅掀開了西方傳教士在華學習中國語言、用中文撰書出版的序幕。

一、羅明堅學習中文

1579年，印度省視察員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 S. J.）希望在中國啟動傳教事業，要求省

*潘劍芬，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現在廣州市海珠區博物館工作。

會長路易·羅特里高·威桑德（P. Rui Rodrigo Vicente）委派一位神父前往中國。當時在馬拉瓦爾（Malavar）傳教的羅明堅因此而被指派到中國傳教。1579年4月，羅明堅由交趾港口乘船前往中國，於7月到達澳門，並按照范禮安的書面指示，“盡心學習閱讀、書寫與講中國語文”。⁽³⁾他於1581年11月寫給麥爾古里亞諾神父的信中訴說了學習中文的艱辛：“中國語文非常難學，超出其他任何國家的文字，因為它無字母，字又多得不可計數，可說世界上有多少字，它也有多少字，因此可知是如何地難學習了。”⁽⁴⁾他甚至認為：“中國人為能達到相當水準，也須讀十五、二十年不可。”⁽⁵⁾當時羅明堅已是三十多歲，承受巨大的壓力去學習一門如此難以掌握的語言，其中艱辛可想而知。但他憑着驚人的毅力，僅僅兩年時間，漢語水準就取得了令人側目的進展。他在1581年的信中寫道：“在服從之下，我盡力學習，托天主的庇佑，目前我已認識了一萬五千中國字，逐漸可以看中國書籍了。”⁽⁶⁾由於羅明堅從一開始就學習官話而不是當地的方言⁽⁷⁾，因而很快就能閱讀並翻譯中文書籍，進而在中國人的幫助下開始用中文撰寫教理書籍。

二、歐洲人在華出版的第一本拉丁文書籍 ——《三字經》

有學者認為，歐洲人在中國最先印行的書籍是1590年於澳門出版的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關於日本使節朝拜羅馬教廷的對話》，或譯為《日本使節赴羅馬教廷日記所載的對話記要》、《天正遣歐日本使節旅行記》、《天正遣歐使節記》〕⁽⁸⁾。事實上，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因為羅明堅早在1581年就把一本中文典籍譯成拉丁文，並在廣州印行。羅明堅於1581年11月12日發信給麥爾古里亞諾神父，並隨信把這本書寄給他。羅明堅在信中寫道：

目前我已認識了一萬五千中國字，逐漸可以看中國書籍了；且於1581年我曾到廣東省會廣州小住，曾翻譯這本中文小冊子，茲祇給您寄去一本，使您可以知道中國字的寫法，同時對中國人的智慧與能力有所瞭解，並也曉得天主如何使

這外教民族深悉倫理道德，以及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去實行。中國人沒有哲學，但有生活與行動的格言去遵守奉行。我的拉丁文不精，但相信辭尚能達意，是我在廣州百忙中移譯與印刷的。這本書不大，與其它的中文與西文著作不可同日而語，但內容豐富，甚受中國學人們的推崇。⁽⁹⁾

羅明堅把中文書隨拉丁文版一起寄給並不認識中文的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是為了讓他“知道中國字的寫法”，又希望麥爾古里亞諾神父通過閱讀拉丁文版瞭解中國人的智慧與倫理道德。這究竟是一本甚麼書呢？羅明堅在信中並未直接指出此書的名字。羅明堅在1582年又把此書寄給耶穌會總會會長阿桂委瓦神父，他在1583年2月寄給總會長的信中寫道：“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書，並附有拉丁文翻譯，從它神父您可以知道中文的情形。”⁽¹⁰⁾信中仍未指出書名。據裴化行考證，羅明堅1582年寄回羅馬的拉丁文譯本應該就是《三字經》。⁽¹¹⁾

根據羅明堅給麥爾古里亞諾神父的信件內容，大致可獲悉下列三點：1）這是一本關於中國倫理道德的書籍，含有中國人“生活與行動的格言”，可作為教育子女的教材。2）篇幅不大但內容豐富。3）甚受中國學者推崇。

應該說，以上三個方面都與《三字經》的內容特點相符。由此可知，歐洲人在華印刷的第一本書籍就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三字經》。1581年在廣州付印的拉丁文版《三字經》，掀開了西方傳教士在華出版書籍的序幕，羅明堅則是翻譯並且出版中國經典著作的第一人，可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先驅。

三、歐洲人在華出版的第一本漢文書籍 ——《天主實錄》⁽¹²⁾

羅明堅於1584年11月出版的《天主實錄》，被徐宗澤稱為“西士華文著述之第一書”。⁽¹³⁾在此之前他已翻譯並出版了《天主經》、《聖母經》和《天主十誡》等傳教單張，但這些印刷的單張不能稱為書籍，因而《天主實錄》在“西學東漸”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又是歐洲人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籍，在中國印刷出版史上亦具重要意義。⁽¹⁴⁾

1581年，羅明堅和澳門神學院院長高麥滋合作，“用拉丁文撰寫了一本要理問答——原名“世界起源簡史”，拉丁文書名為 *Vera et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XIV*。1582年，羅明堅開始將這本《要理問答》“譯成中文，作為介紹天主教要理的橋樑”。⁽¹⁵⁾ 中文書名為《天主實錄》。此書主要參考了他過去讀書時使用的教理講義，但羅明堅並不是機械地翻譯，而是努力嘗試用自己的語言來表述天主教思想。由於中文水準有限，羅明堅請了一位生於福建的司書來幫忙編輯，“寫的時候是先將拉丁文譯成中語講給這位司書聽，然後他按照所領略的程度，而寫成中文”⁽¹⁶⁾，成書後再由羅明堅複閱修改。一直到“1583年年尾，羅明堅（對《天主實錄》）的複閱工作方始完畢，以後又由利瑪竇和一位肇慶知府的儒士〔據張奉箴考，此儒士為福建建甯，但據利瑪竇的書信可知，此書亦經由嶺西道尹王泮為其潤色——筆者註〕，修改了四五個月的工夫，這才粗（初）具規模”⁽¹⁷⁾。1584年2月，羅明堅於澳門致信告知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現在我已校正了我的《新編天主實錄》⁽¹⁸⁾，是用中文撰寫的，用了四年功夫，曾呈獻給中國官吏批閱，他們曾予我褒獎，要我趕快印刷，越快越好；視察員與其他神父都審察了一番，認為沒有問題，也讓我趕快去印刷。”⁽¹⁹⁾ 羅明堅於當年9月21日把他的中名寫在序文上，標誌着此書的最後定稿，“印刷工程是在11月27或28日完工”。⁽²⁰⁾ 這樣，羅明堅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出版了第一本用中文介紹天主教教義的著作——《天主實錄》。

（一）中西合璧的內容與形式

1) 扉頁：這本教義問答被冠以地地道道的中文書名“新編天主實錄”，扉頁上中西合璧，中間靠上是一個橢圓形，中心是十字架及耶穌會標誌 IHS，圍繞着它有一句拉丁語讚美詩“A SOLIS ORTVSQUE AD OCCASVM LAVDABILE NOMEN DOMINI PS: CXII”。橢圓形四周寫着中文，上刻“解此番字周圍真經”，左右分別寫有“天主之名當中”和“益揚乾坤明教”，下半有“天主實錄正文”幾個大字。

2) 內容：其內容和表達形式更是中西合璧的，“是一位中國教外學人詢問種種問題，一位歐洲神父一一回答”⁽²¹⁾，也就是通過非信徒的中國人和西方神父之間的對話，闡明“天主教之根本道理，給外教人以聖教初步的認識”⁽²²⁾，既是一本要理問答，又是一部天主教教義，全面地闡述了西方基督教的教理。羅明堅首次把基督教義中的 *Deus* 譯為“天主”，還創造性地翻譯了許多術語，如寵愛、天堂、魔鬼、地獄等等，這些譯法一直沿用至今。此書最後落款為：“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天竺國僧書〔即此書定稿時間為1584年9月21日〕、‘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目錄’、‘新編天主實錄’。書後有附頁：1.祖傳天主十誡（黑體印刷）；2.祖傳天主十誡（藍體印刷）；3.拜告。”⁽²³⁾



歐洲人在華出版的第一本漢文書籍《天主實錄》
選自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3.

3) 印行方式：這本由歐人寫的關於西方宗教的中文著作，經由多位中國人為其潤色修改⁽²⁴⁾，然後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術印刷。可見無論是其內容或是印行都是中西合璧的，充分體現了中西方文化高度的交匯與融合。儘管《天主實錄》撰寫的水準不高，但它是歐洲人在中國編著、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籍，無論在傳教史上或是傳教士在華出版史上均有重要意義。

(二) 刻印地點及版本

《天主實錄》的初版是用雕版刻印的，有兩本被送往梵蒂岡（其中一本用絲綢印刷），現均存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²⁵⁾現在上海徐匯樓亦有再版的藏書。但這本書的初版具體是在澳門，或是在廣州、肇慶刻印，目前尚有爭議。著名葡萄牙學者白樂嘉認為此書印於澳門：據里斯本檔案館的一份檔案記載，羅明堅神父在澳門準備了一本由中國學者用中文書寫的教義問答手冊，（……）他印刷了這本中文版的《教義問答》並傳播到中國各地。由於書目學家不熟知里斯本的這份古老的檔案，誤以為這本書不是在澳門而是在中國的其它地方出版。⁽²⁶⁾另一位葡萄牙學者施美麗也認為此書刻於澳門：“澳門的耶穌會教徒用傳統的木版雕刻印刷術印製了第一部由歐洲人指導編著的中文書籍。（……）他（指羅明堅）請了一位書法雕刻師傅，將全書一字一字地雕刻在木板上，而後印製成書在中國傳播。”⁽²⁷⁾裴化行著的《利瑪竇神父傳》則認為此書刻於肇慶（依據德禮賢編的《利瑪竇全集》）。⁽²⁸⁾然而，費賴之說此書“是為歐羅巴人最初用華語寫成的教義綱領，於1584年月11月抄刻於廣州”⁽²⁹⁾，另有其他中國學者也認同此書出版於廣州，如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引用了此說法。⁽³⁰⁾張靜等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寫道：“（羅明堅）用中文寫了一本《天主實錄》，宣揚天主教，該書曾於1584年刻於廣州，流傳很廣。”⁽³¹⁾中外關係史研究者沈定平認為此書是“在廣州由傳教士自己購置的機器付印出版”⁽³²⁾。

《天主實錄》曾多次重印，因而有多個版本，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就藏有四種刻本：

1) 編號 Jap. Sin. I 189，書名為“新編天主聖教實錄”，最後落款為“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天竺國僧書”。這是初版，上文已作介紹。

2) 編號 Jap. Sin. I 189a，書名為“新編天主聖教實錄”，完全為初版本的影印本。

3) Jap. Sin. I 190，書名為“天主實錄”，內容與前兩版本相比，落款多了“天竺國僧明堅撰”，後面則沒有了附頁。

4) Jap. Sin. I 55，書名為“天主聖教實錄”，此書扉頁有耶穌會會徽，但會徽周圍無字，落款為“耶穌會後學羅明堅述”。⁽³³⁾

第四個版本，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藏本，據方豪考證，這個重訂本有三位重訂人，其中孟儒望（P. Monteiro）崇禎十年（1637）來華，可斷定這是晚出的本子。⁽³⁴⁾1594年，耶穌會批准了利瑪竇去僧服、着儒服的建議⁽³⁵⁾，隨之是1595年停止散發初版的《天主實錄》，甚至印刷雕版也在1596年上半年銷毀了，因為“據認為這本書過於簡單，尤其是其中佛教用語到處可見”⁽³⁶⁾。這樣看來，第四個版本應該是1637年後耶穌會士經過修訂重新刻版印刷，因而已拋棄了前三個版本的落款“天竺國僧”字眼，改為“耶穌會後學羅明堅述”。再看第三個版本，羅明堅在落款處仍自稱為“天竺國僧”，可推斷這個版本是在1594年之前刻的。前兩個刻本的內容完全一樣，都是最早版本。極有可能這兩個最早的刻本1584年分別印刷出版於廣州和澳門。

羅明堅在范禮安神父的指導下，編著《拉丁文-中文辭典》，於1585年在澳門印刷出版。這本辭典應該是西方傳教士著作、出版的第一部學習中文的工具書，其手稿現存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³⁷⁾1588年11月20日，羅明堅奉命回羅馬“請教宗派遣使節來華，和中國皇帝通好”⁽³⁸⁾。教皇遣使計劃最終被束之高閣，羅明堅被送回意大利。由於與利瑪竇在傳教策略上有分歧，羅明堅不能再回到中國繼續其傳教事業，祇好默默地在家鄉著書、傳教，直到1607年5月11日平安去世。⁽³⁹⁾作為中國傳教事業的開創者，他在基督教史上永遠佔據着一席之地。

西方漢學的奠基人 —— 利瑪竇

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最出名的來華西方傳教士，他首次正式地向中國介紹了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同時也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學術界關於利瑪竇的研究已是碩果纍纍，此處僅對其來華早期在穗澳兩地的著作、出版活動作一簡單勾勒。

一、利瑪竇學習中文

按明朝的規定，祇有三種外國人能進入中國內地：在職的公使；伴隨公使而來的商人；仰慕中國的文化政治而來的外人，並可得到居留權。⁽⁴⁰⁾因而，無論是利瑪竇或是羅明堅，為了取得在中國的居留權都有意無意都在表面上把自己定位為“仰慕中國文化政治而來的外人”。利瑪竇來華後的首要任務是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憑着他驚人的記憶力及過人的才華，利瑪竇的中文水準很快就超越了先他而到中國的羅明堅。他明智地廢棄了和尚裝束改穿儒服，向士大夫靠攏。他通讀中國儒家經典，充分瞭解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看到了書籍對於中國士人的吸引力，於是殫精竭慮用中文撰寫並出版了大量著作。可以說，學問和著作，是他得以平安居留在中國的重要因素。他在寫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的信中也道出了這種認識：“（……）另外一個因素是我所撰寫的書為我們的居留也有了保證，我們的教友朋友與非教友也知道很清楚，我們來到中國是為締造和平、勵德修身，要人服從帝王而來，而非為交戰、作亂而來。”⁽⁴¹⁾利瑪竇正是利用他們的學問和他們撰寫的書籍，先與中國的有識之士接觸來往，引起同情，在無形之中灌輸基督教的道理，使耶穌會在中國立穩了腳跟。

二、取得中國傳教團的印刷許可權

利瑪竇認識到，對中國人直接傳教是行不通的。他認為，在中國禁教的情況下，“用書籍傳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為書籍可以在任何地方暢行無阻”，如果把有關天主教的一切“皆筆之於書，那麼聖教會祇要一些指點與訓誨便可因而自傳了，尤其是在沒有神父的地方”⁽⁴²⁾。基於對書籍傳教力量的

深刻認識，利瑪竇去信耶穌會總會長，指出中國傳教團沒有印刷許可權是如何被動。他在信中指出了這種困境：“很多中國人要我多撰寫些東西，介紹西洋科學，但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沒有獲得印刷的許可，沒有總會長准許，也無印度審查長的應允。”⁽⁴³⁾他們撰寫的書籍必須要經總會長或印度審查長審批之後才能印刷，這在交通落後的時代，是一件相當麻煩費力的事情，寫好的書籍往往不能及時出版。因此利瑪竇在信中再次強調書籍的重要作用，並建議耶穌會把書籍審查和印刷許可權交給中國傳教團：“我以為您應把印刷許可權賜給本區會長，以便能快速出版有關書籍，在審查後便可印刷，正如在日本一樣，不必件件須從印度審查長處獲此特准。這為中國特別重要，因為所有教派多以書籍，而不以口講作宣傳；獲取高官厚祿也是利用撰寫佳作，而不是利用口才獲得。無論如何，凡書籍既已獲得省會長的准許，祇要讓通中文的人再校正一下，就可出版。”⁽⁴⁴⁾

在利瑪竇的努力之下，印刷書籍的許可權終於交付給中國傳教團。這意味着耶穌會在華的印刷活動有了自主權，為他們在華大規模開展印刷出版活動提供了可能性。

三、在穗澳的著作與出版

利瑪竇在華活動生涯中用中文撰寫並出版了大量的著作，然而，穗澳地區僅是他進入內地傳教的跳板，他在這兩地的逗留時間不多，但是他在這裡出版的著作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一）《中國之奇異》：利瑪竇自從1582年8月在澳門登岸後，立刻幫助范禮安編了一部書《中國之奇異》。此書內容豐富，囊括了“人民、城鎮、天然物產、地土肥瘠情形，朝廷收入，各地財富，內地稅收、工業管理、政府內政，可謂應有盡有，是一部很完備的參考書籍。（……）伴同這部書發行的，有一張由利瑪竇按照中國典籍繪成的〈中國全圖〉”。⁽⁴⁵⁾這部書被收在范禮安神父所著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三章，但有時也單獨刊行。它應是利瑪竇來華後參與撰寫的第一本書。他初到中國，書中對中國文明及其概況的描述，難免有不

夠準確的地方，但這部書為外國人瞭解中國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訊。

(二)《對話》：安·貝萊神父(Henri Bernard)在《利瑪竇神父和當時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到，澳門耶穌會傳教士於1590年印刷了利瑪竇的著作《對話》。⁽⁴⁶⁾

(三)《天主實義》：它是利瑪竇著作中最具影響力的宗教書籍之一。利瑪竇來華不久就參與了羅明堅的《天主實錄》一書的修改，後來隨着他的中文水準不斷提高，認識到這部書佛教用語到處可見，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於是停止散發這本書，並按范禮安的要求另寫一部。范禮安要他“既不放棄原來依據天然秩序而運用的理由，又引述中國典籍以權威論據予以論證”⁽⁴⁷⁾。利瑪竇沒有讓范禮安失望，他引經據典地用流暢的文筆寫出了著名的《天主實義》。此書以中國儒家思想來解釋天主教教義，試圖調和兩種不同背景的文化傳統。它對中國士大夫的心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連中國最高統治者也感到不容忽視：“清康熙因着它的潛移默導，竟於1692年3月22日頒了一道解放宗教的詔諭。即便是壓迫天主教的乾隆，也把它收入《四庫全書》。”⁽⁴⁸⁾這本書於1595在南昌出版，初名“天學實義”，1630年以前在北京、杭州、廣州等地再版五次以上，1630年後再版之次數已經多得無法統計。

1608年，利瑪竇致信給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告訴他《天主實義》在日本也很受重視，范禮安在廣州重印了一批，專門是送往日本的，因為“中文編譯的書在日本也可通用”。⁽⁴⁹⁾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論叢》一書中提到范禮安將這本書重印於澳門。⁽⁵⁰⁾1604年，此書被譯為日文，在澳門重印了三次。⁽⁵¹⁾僅由此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利瑪竇的著作受人重視的程度。作為西方漢學的奠基人，利瑪竇在傳教士出版活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澳門首套鉛活字印刷設備的引進者范禮安

16世紀末，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首次把鉛活字印刷設備帶到了澳門，這是中國印刷術西傳改進後的第一次再回“娘家”，掀開了中國使用活字印刷機器的序幕，雖

然它未對中國的印刷業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但它揭開了近代機械印刷業的先聲，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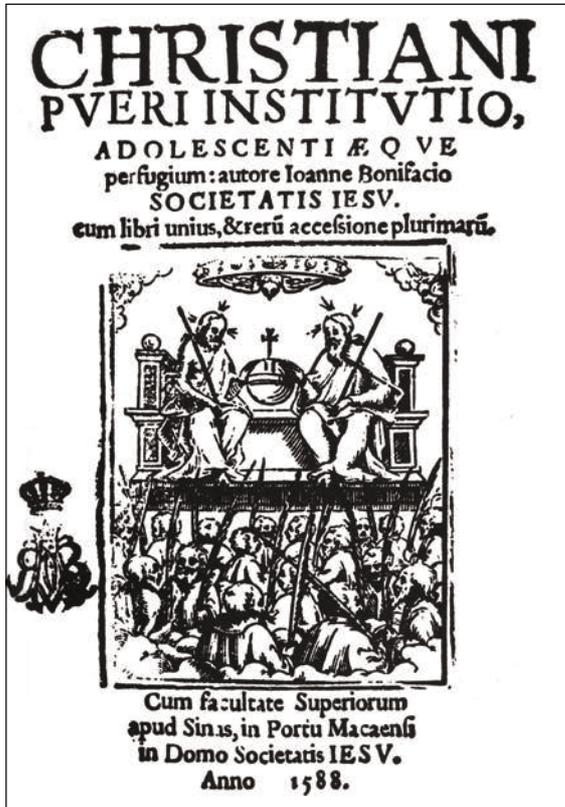
一、范禮安的傳教策略

范禮安於1538年12月20日生於意大利的希埃蒂城(Chieti)阿布魯(Abruzzi)。十八歲在巴度阿(Pádua)大學民法系獲博士學位，1566年加入耶穌會。1573年8月，他奉教團總主持艾·梅圖里亞奴(Everardo Mercuriano)之命去日本和印度傳教。范禮安於1578年首次途經澳門，次年即提出派遣神父到中國傳教，希望開啟中國的傳教事業。1582年，范禮安促成了第一個日本基督教使團前往羅馬學習，並於3月2日陪同四位日本使節⁽⁵²⁾離開日本，一週後到達澳門，逗留了九個多月。這是范禮安第二次抵達澳門，正是這次訪問，讓范禮安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國的傳教事業上。⁽⁵³⁾看到羅明堅等在澳門的傳教活動進展緩慢，仍未能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范禮安在澳門打開房間的窗戶，含着眼淚，充滿嚮往地看着中國內陸喟然歎道：“巖石呀巖石，你何時才打開？”⁽⁵⁴⁾

當時，“凡是領洗入教的中國人，都要變成葡萄牙國人或西班牙國人。在姓名、服裝、風俗上都要按照葡、班兩國的式樣”⁽⁵⁵⁾，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對皈依中國人的前景感到悲觀，甚至對初到的羅明堅說：“任何改變中國人的信仰的努力都是浪費時間，就像試圖把一個埃塞俄比亞人變成白人一樣。”范禮安非常惱火，命令神父們不要試圖把為數不多的中國教徒“葡萄牙化”⁽⁵⁶⁾。他在詳盡地瞭解中國國情之後，徹底改變了耶穌會的傳教方針。他認為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泱泱大國，與其使中國人葡化，不如使傳教士中國化，提出入教的中國人固然仍舊是中國樣子，西洋的傳教士也都要“中國化”。范禮安認為如果不懂中文，根本無法使中國人信奉天主教，因而指示傳教士要悉心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並用中文撰寫教義教理。范禮安的傳教方針是正確的，他被喻為“中國的傳教之父”。

二、日本基督教團從歐洲帶回了活字印刷設備

具有遠見卓識的范禮安神父認識到印刷機器將成為遠東傳教有力的輔助工具，在他多方努力之



中國使用歐洲鉛活字印刷的第一本書：拉丁文著作《基督教幼教——青少年行為指南》的封面，1588年開印於澳門，作者為耶穌會士若奧·博尼法西奧。選自《大三巴牌坊：永垂青史的紀念碑》第150頁。

下，1587年，日本基督教使團帶著夢寐以求的全套活字印刷設備從羅馬返回日本，使團中有兩位日本人已在葡萄牙學會了印刷技術。日本基督教使團返程中到達果阿的時候，范禮安神父被告知結束了印度教區大主教的職務，他可以重新率領日本使團去日本進行傳教活動了。他們從果阿乘船，準備經澳門前往日本。使團於1588年8月11日到達澳門，他們發現必須在此等候，不祇是為了等待下一季節季風的到來⁽⁵⁷⁾，更是為了等待適宜的時機。這是因為豐臣秀吉（Hideyoshi）於1587年7月24日頒佈“禁教令”，強令所有傳教士在二十天內離開日本，並強行限制外國人，尤其是傳教士進入日本。范禮安沒有想到，就在“天正少年使團”在歐洲巡遊引起轟動的同時，日本教會卻因豐臣秀吉的“禁教令”遭

到了沉重的打擊。為了避免刺激仇視基督教的豐臣秀吉，范禮安祇好使用掩耳盜鈴的手法，寫信給豐臣秀吉聲稱自己是印度總督委任的外交使節，試圖以這一身份進入日本。這樣，范禮安神父和使團、隨從人員被迫停留在“阿媽港的天主聖名之城”中的耶穌會學院總部，等待來自豐臣秀吉的答覆。⁽⁵⁸⁾

三、澳門第一個西式印刷所

1588年10月，在澳門等待前往日本的期間，范禮安神父把印刷機器安置到耶穌會開設的聖保祿公學（聖保祿學院的前身），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澳門第一個西式印刷所⁽⁵⁹⁾，以充分地發揮這套先進的活字印刷機器的作用。此時的印刷所尚未有中文鉛字，祇有西文鉛字以及日本旅歐傳教團的成員帶回的日本字字模，印刷工作主要由以下兩位日本旅歐傳教使團成員及一位尼伯爾人負責：

1) 依爾芒·若熱·德·洛約拉，日本人，旅歐傳教團中出類拔萃者，在葡萄牙學會印刷技術，1589年死於澳門，是日本旅歐傳教使團中唯一沒有回到故土的人。

2) 康斯坦蒂諾·多拉多，日本人，旅歐傳教團成員，講授理課教師的助手，1617年在澳門參加耶穌會。他在葡萄牙學會印刷技術，帶回了印刷模子。

3) 依爾芒·喬瓦尼·巴蒂斯塔·佩斯切（Iramo Giovanni Bathista Pesce），尼伯爾人，被稱為“尼伯爾印刷機之王”，參加了澳門活字印刷的頭兩次工作。1627年死於澳門。⁽⁶⁰⁾

這幾位活字印刷能手在范禮安神父的指導下，為澳門的活字印刷事業開闢了道路：1588年末，他們印行了第一本書：拉丁文版《基督教幼教——青少年行為指南》（見圖，*Christiani Pveri Institvtio, Adolescentiae qve per fugium*），這不僅是澳門用活字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中國使用歐洲鉛活字印刷的第一本書，可以說是西方活字印刷術首次來到中國的標誌。這本書看似由日本使節從歐洲帶回來的⁽⁶¹⁾，原作者是若奧·博尼法西奧（João Bonifácio），由范禮安神父編輯，改寫後重印（此書於1575年在薩拉馬克（Salamanca）首次出版，隨後在布格斯（Burgos）再版過），共252頁，題名上還

注明印於1588年。現僅有一本存於里斯本的阿茹達宮殿圖書館。⁽⁶²⁾此書後來一再重印，從16世紀到17世紀20年代共印刷了八次之多，可見其對傳教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其內容是聖經、天主教教義和經典作品的摘要，是一本教育天主教兒童必不可少的讀本。⁽⁶³⁾

1588年11月22日范禮安神父在澳門收到了日本當局回覆，被告知“如果他真是印度總督派來的使節，那將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每年一次來往於澳門—日本的商船剛剛起錨⁽⁶⁴⁾，他們祇好留在澳門繼續等待。

1590年，范禮安在澳門印行了拉丁文版《天正遣歐使節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此書詳盡地記載了日本傳教團在歐洲受到最熱烈、最激動人心的接待及在歐洲各地的見聞。他們在羅馬受到光榮的接見，在聖彼得及這座聖城中的其他地方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慶典，所有這些均在書中作了詳細描述。該書是由范禮安、孟三德（Pe. Eduardo de Sande）、利瑪竇等多名耶穌會士共同撰寫的。當時孟三德神父在澳門擔任中國傳教會會長，范禮安要求孟三德將原來為西班牙文的初稿譯為拉丁文，在澳門刊印出版作為日本神學院的拉丁文教材。該書現存十二本。1592年，蒂尤斯（Madre de Dios）把這本書從澳門帶回了歐洲。年輕的英國地理學家理查·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 1533-1616）想方設法得到此書，並從中取出一部分譯成英語於1599年出版，書名為《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發現》。哈克盧伊特譯印這本書時，並沒有提到此書作者的姓名。書中介紹了中國的疆域、皇家稅收、北部邊防、長城、人口、府縣數目、中國歷史上的內戰及戰亂帶給人民的苦難、手工業（包括製瓷、印刷、製炮）、繪圖、航海、天文、農作物、宗教、政府組織、內閣、官員的陞遷、皇帝和皇室等。這本書最有意義的地方，就是較為詳細和準確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該國的文字幾乎是無數的，而且極為有趣。（……）由於這些文字學習的精進，就像我們歐洲人那樣，習慣於在優秀的學生中間設立下、中、上三種學階。擁有第一種學階（即下級學階）的人稱為秀才（*sinsai*），第二種學階稱為舉人

（*Quiugin*），第三種學階稱為進士（*Chinzu*）。”這部分內容是由孟三德寫的，應該包括他在中國的親身體驗。⁽⁶⁵⁾書中還第一次由西方人向外部介紹了中國的三大宗教——佛、道、儒三教，尤其是儒教。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內容是16世紀末歐洲人中國觀的一個縮寫。⁽⁶⁶⁾據學者們的研究表明：“上述談論中國的專章是西班牙原文中沒有的，它是孟三德和范禮安共同增補列入的。關於此舉的目的，人們認為，它不僅是要向日本人傳達情況，而且是想利用此書的印刷出版，向歐洲通報中國國情以及教會面臨很大困難。”⁽⁶⁷⁾

此外，其間至少還有一本以上的書在澳門出版，如 *Senazario Emmendado*，可惜已佚存。據羅·麥西亞（*Lourenço Mexia*）神父考證，此書於1589年10月8日之前印於澳門，大概是迦·桑那甲農（*Iacopo Sannazzaro*）的詩選。⁽⁶⁸⁾

印刷所一年多以來出版的均為西文書籍。按范禮安的指示，出版的書籍部分留給中國的傳教士，其餘的由他們日後帶往日本。1590年6月29日，范禮安神父以印度總督使節的身份率日本使團離開澳門赴日本，並於1590年7月21日到達日本長崎。范禮安帶去了整套的印刷機器，在日本京都、勝田、天草等地印刷了大量書籍。⁽⁶⁹⁾1612年，日本幕府再次重申禁教令，並於1614年開始驅逐、迫害耶穌會士。正因這一迫害，“耶穌會士決定將寶貴的印刷機運往耶穌會安全的大本營——澳門，重新安裝在聖保祿學院。”⁽⁷⁰⁾1620年，這套機器在澳門留下了它最後一次印行：《日語語言藝術》（*Arte Breve da Lingoa Japan*）。這是由陸若漢神父（*João Rodrigues*）撰寫的日本語法書，與《天主實錄》的扉頁一樣，此書扉頁中間的橢圓形正中心也印有十字架及耶穌會的標誌“*IHS*”，封面上寫有“印刷於中國澳門聖保祿學院”等字樣。之後，這套設備被賣給了馬尼拉奧古斯丁教會。⁽⁷¹⁾

這臺印刷機器往返於澳門與日本之間，一共印刷了多少書籍，至今已難以得出確切的數字。但是，根據日本東京上智大學（*Universidade Sophia de Tóquio*）教授羅雷斯神父（*Joannes Laures*）搜集的結果，現存書籍三十本，另外僅知書名但已佚失



《天正遣歐使節記》，1588年印於澳門，由范禮安、孟三德等多名耶穌會士共同撰寫，孟三德譯為拉丁文。選自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6.

的也有二十五本，總計有五十五本。其中有三十本是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印刷的，其餘是在日本印刷的。⁽⁷²⁾這些在澳門印行的書籍，隨着聖保祿學院的師生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必定流傳到了中國各地，為傳播天主教發揮了作用。

范禮安神父在澳門成立的第一個西式印刷所，應該也是中國第一個西式的印刷所。可惜這套先進的印刷設備在印刷所僅停留了六年多（1590-1614年在日本），也沒有製造出中文活字用以印刷中文書籍，如果把它作為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之始未免過於牽強。在歷史的舞臺中，這更像是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的一個開幕式。范禮安作為澳門的首套鉛活字印刷設備的引進者，無疑是這個開幕式上的主角。

結語

16世紀末，范禮安確立了使傳教士中國化的適應性傳教策略。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忠實地執行范禮安的傳教策略，努力學習中國語言和研究中國文化，他們以中文著書或翻譯西方的著作，並印刷出版用以輔助傳教。縱觀耶穌會士在穗澳兩地出版的書籍，大部分是神學出版物，充分體現他們的出版活動主要是為了傳播基督文化；其次是關於語言學習的著作，據此可知，耶穌會士在發展傳教事業的過程中為解決語言的障礙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另外還有關於文學的出版物。羅明堅把中國的經典著作《三字經》翻譯成拉丁文出版，多次把《三字經》寄回歐洲。他又和利瑪竇一起研究、翻譯《四書》。⁽⁷³⁾《四書》手稿被寄回意大利，雖然沒有印行，不能廣泛流傳，但為當時的歐洲人瞭解中國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戶，為後來中國儒家經籍流行於歐洲各國並形成“中國熱”奠定了基礎。羅明堅、利瑪竇致力於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而成為了西方漢學研究的先驅，澳門和廣州也因此成為早期漢學活動的基地。我們應該肯定，耶穌會士在編印著作宣揚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時，促進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向歐洲國家的傳播，促成了西方漢學的發軔，對中國印刷出版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註】

- (1) [法] 裴化行著，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261。
- (2)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序》，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發行，1986年，頁16-17。
- (3) (4) (5) (6) (9) (10)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頁431；頁431；頁446；頁431；頁431；頁446。
- (7)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p. 91.
- (8) 吳孟雪、曾麗雅：《明代歐洲漢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41。《關於日本使節朝拜羅馬教廷的對話》一書在大英博物館有藏本，其提要上寫着：“是為歐羅巴人在中國首先印行之書。”[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1。
- (11) Pan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Allen & Unwin Austrandia Pty Ltd, 1986, p. 6；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東方出版社，2001年，頁234。
- (12) 筆者注：初版稱《新編天主實錄》，後來再版又稱《天主實錄》、《天主聖教實錄》，學界多以《天主實錄》稱之。

- (13)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頁108。
- (14) [法]裴化行著，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263；[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晚明基督論》，四川人民出版社，頁109。
- (15) (21)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頁43；頁59。
- (16) (17) [法]裴化行著，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264；頁261。
- (18) 《天主實錄》初稿於1581年完成，起初用拉丁文寫成，書名為 *Vera et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不少手稿被廣泛傳閱，內容也得到修改，利瑪竇也參與了修改。這就是為甚麼最後版本(1584年11月21日)被稱為“新編”的原因了。以上轉引自柯毅霖著《晚明基督論》。
- (19) (21)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頁457。
- (20) [法]裴化行著，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261。
- (22)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2。
- (23)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頁243。
- (24) 參見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頁59、頁84(其中有嶺西道尹王泮親自為此書潤筆，他1584年陞任兩廣總督，對羅明堅、利瑪竇的傳教活動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 (25) (26) (37)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3; pp. 33-34.
- (27) 施美麗 (Beatriz Basto da Silva)：〈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王複山譯，《文化雜誌》中文版第6期，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頁10。
- (28) 《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72頁，第2卷117頁，轉引自[法]裴化行著，管振湖譯：《利瑪竇神父傳》，頁163-164。
- (29)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29。
- (30) (3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49。
- (31) 李喜所主編、張靜等著：《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401。
- (32)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45。
- (33) 關於這四個刻本的內容參見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頁244。
- (35) (36)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頁167；頁163-164。
- (38) [意]德禮賢 (Pasquale M d' Elia)：《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海：商務印刷館，1934年，頁70。
- (39)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序》(上)，頁16。
- (40) (45) [法]裴化行著，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冊，頁242；頁256。
- (41) (43) (44)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頁324。
- (42)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8年，頁328。
- (46) 安·貝萊神父 (Henri Bernard) 著：《利瑪竇神父和當時中國社會 (1522-1610)》，天津，1977年，頁115，轉引自文德泉 (P. Manuel Teixeira)：〈四百週年——澳門印刷業〉，《文化雜誌》第6期，頁6。
- (47) [法]裴化行著，管振湖譯：《利瑪竇神父傳》，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63-164。
- (48) [意]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頁59。
- (49)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頁366。
- (5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論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81。
- (51)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41。
- (52) 由於這一使團於日本天正年間派出，許多文獻稱之為“天正少年使團”。范禮安本想親自帶領使團前往羅馬，但他在1583年被任命為印度大教區視察員，祇好委託勞諾·羅格里德斯 (Nuno Rodrigues) 神父和迪奧戈·德·梅斯基塔 (Diogo de Mesquita) 神父代替他領導日本傳教團前往羅馬。參見〈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施美麗 (Beatriz Basto da Silva) 著，王複山譯，《文化雜誌》中文版第6期，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頁12。
- (53) 馬拉特斯塔 (S. J. Edward Malatesta)：〈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1期，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
- (54)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 John Snow. 2b, Paternowter Row, 1838, p. 225.
- (55) [法]裴化行著，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194。
- (56) [葡]費爾南多·克雷亞·德·奧利維拉著，楊立民、王燕平譯：《葡中接觸五百年》，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基金會，1999年，頁54。
- (57) 當時前往日本的商船，常要在澳門逗留很長一段時間以等待順向的季候風。
- (58) 此段參見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3, 以及威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09。
- (59)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35。
- (60) 關於這幾位印刷能手的簡介參見施美麗 (Beatriz Basto da Silva)：〈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王複山譯，《文化雜誌》中文版第6期，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頁13。
- (61) Manuel Cadafaz de Matos, Ph.D., "The Missions of Portuguese Typography in the South of Chin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John W. Witek (ed.), *Religion and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 Paul, Macau, 28 Nov. to 1 Dec. 1994*,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9, p. 83.
- (62)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p. 34.
- (63) (64) 施美麗 (Beatriz Basto da Silva)：〈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王複山譯，頁14；頁13。
- (65) 《天正遣歐使節記》，*De Missione Legatorv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泉進久之助等譯，轉引自《遠東天主教史研究初編》，未刊本，2006年。
- (66) 參見吳孟雪、曾麗雅：《明代歐洲漢學史》，頁40-41。
- (67) 《天正遣歐使節記》解說，頁715，轉引自《遠東天主教史研究初編》，未刊本，2006年，頁81。
- (68)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5；文德泉 (P. Manuel Teixeira)：〈四百週年——澳門印刷業〉，《文化雜誌》第6期，頁6。
- (69) 參見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6.
- (70)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頁136。
- (71)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p. 36, 37, 38.
- (72)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頁137。
- (73) 《四書》的手稿現存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º 12 (Julho -1963), p. 34.